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

三星堆 与南方丝绸之路

SANXINGDUI YU NANFANG SICHOUZHILU

编辑委员会

顾问：	侯水平	蒲 波	赵 辉		
主任：	卢 也	李明泉	段 渝		
成员：	卢加强	刘泽球	屈 直	廖立新	范小平
	邹一清	邱登成	李 斌	陈国世	蒲秀政
主编：	段 渝	范小平			

前 言

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初“巴蜀文化”命题的正式提出，迄今已经 70 多年。如果从 1933 年四川广汉月亮湾的首次考古发掘算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研究已有 80 多年。80 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学者前赴后继，筚路蓝缕，投身于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 60 多年，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支持，考古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大量新材料不断问世，使学术界得以比较充分地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新成就，不但彻底否定了前人所谓“蜀无礼乐，无文字”的旧说，而且提出了“三星堆文明”“巴蜀古代文明”和“巴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的崭新论断，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并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这一切，使学术界对巴蜀文化的重要学术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正如李学勤教授总结的那样：“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可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李学勤教授还曾经在 2007 年于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召开的“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研讨会”上指出，三星堆文明具有非常高的学术意义，三星堆是有着相对独立起源和发展脉络，并且高度发展的区域性文明，应该放在更大的文化范围内来看，对照古埃及年表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新阶段性成果，以两个祭祀坑为代表的繁盛时期的三星堆文明与晚期的商文明、新王朝时期的古埃及文明及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几乎同时。三星堆的发现应当与尼尼微、特洛伊的发现相媲美。南方丝绸之路是欧亚学研究的一部分，以前，学术界不是讲“欧洲中心论”，就是讲“中国中心论”，从来没有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将三星堆文明放在整个欧亚文明之中，将欧亚大陆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南方丝绸之路正是将三星堆文明与古代欧亚文明相联系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将南方丝绸之路纳入古代欧亚文明整体研究之中，这是新世纪以来学术界的重大成就，也是三星堆文明研究的关键性突破口。

三星堆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是相互关联的两个课题。将三星堆文明放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去观察和研究，必将涉及文化交流互动的途径和具体内容等问题，即：位于中国西南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明是通过何种途径、何种方式与其他文明发生关系的？这种关系的性质是什么？文化交流互动的内容是什么？这种交流互动对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说三星堆文明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深入研究三星堆文明必然要面临和解决的既具实证性又具理论性的重大课题。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正是解开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点。只有深入系统地研究南方丝绸之路这个课题，才能够最终解决三星堆文明的开放性和世界性问题。另一方面，对三星堆文明的深入系统研究，又将为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提供极为重要的实证和理论资料。通过对这两个紧密关联课题的透彻研究，必将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 1877 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提出的，用以指称中国丝绸西运罗马的交通道路，后来被用以泛称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长期以来，丝绸之路一直被认为是由长安出发，西经河西走廊，出西域至中亚，然后进抵罗马帝国的唯一的一条中西交流道路。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又确认丝绸之路还包括长城以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由东海至南海，经印度洋航行至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从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至缅甸、印度、中亚和至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从而大大扩展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成都平原为重心的，分布于云南至缅甸、印度和越南等区域内，近年出土大量相同、相似或相关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中国文化，而且有印度乃至西亚的文化因素集结，同时在东南亚、南亚、中亚至地中海区域发现了不少中国文化因素，表明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同外部世界所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交流线路的存在。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线路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以成都为起点，向南经云南出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至西亚，以及从成都经云南至东南亚的古代中外国际交通线为“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纵贯亚洲，直抵欧洲地中海区域，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长、历史最悠久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动脉之一。经由南方丝绸之路，中国文明传播到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并与上述地区的古代文明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互动，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学术界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前期开始的中缅印交通研究。20 世纪 40~70 年代,不少学者对此发表过专门论著进行讨论,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这个具有国际学术意义的重大课题没有得到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中国西南与南亚、东南亚的古代交通与贸易问题开始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一批学者考察了从四川成都到云南腾冲的交通线,明确了这条线路的主要走向。在学术界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掀起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许多中外知名学者参加研讨,举办学术研讨会,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and 影响,有力地推进了西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交流。其成果是,明确了先秦时期存在一条从中国西南通往南亚、东南亚的交通线路;这条线路是古代中国西南与域外进行贸易往来、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通道。

进入 21 世纪以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更多关注,先秦史学者、考古学者、民族史学者和中外关系史学者纷纷加入讨论行列,研究对象也从国内扩展到国外,从对具体线路和节点的研究扩展到对围绕线路所发生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动等研究。鉴于以往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境内段的考察和研究上,对南方丝绸之路缺乏完整全面的认识等情况,2007 年以来,四川学术界将南方丝绸之路境外段的考察与研究列为重要科研项目,数批学者到国外进行实地考察并搜集资料。与此同时,学术界举行了“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中国西南与欧亚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南方丝绸之路研讨会”等一系列大型研讨会,并举办了“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展”,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推向了新的发展高度,掀起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新高潮。李学勤先生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丝绸之路的研究在学术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几条丝绸之路里面,最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南方丝绸之路。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做出重要指示、国家全面规划建设“一带一路”的新形势下,学术界积极响应,多学科、多部门加强联系与合作,大力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在既有的学术成果基础上,学术界将学术研究的突破口定位在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方面:经由南方丝绸之路,四川、云南、贵州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南地区与中原及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西南与南亚、西亚、东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以经济文化交流和互动为主要线索,深入探讨南方丝绸

之路。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结合紧密结合，注定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远大而辉煌灿烂的前景。

在古代，丝绸之路是一个巨大的国际交通网络和贸易体系。今天，在全球经济文化发展与进步的新形势下，丝绸之路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这就是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国与欧亚各国之间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而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德阳正处于南、北两条丝绸之路的连接点，具有丝绸之路枢纽的重要地位。我们今天举办“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就是要在当前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形势下，以学术研讨、交流的形式，探讨如何以南方丝绸之路为载体，进一步开发以“三星堆文化”为名片的德阳历史文化，使德阳加快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之中，为实现德阳经济文化腾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

侯水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博士、教授、研究员

2016年11月

目 录

三星堆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	段 渝 (1)
成都: 中国三大经济带的交汇点与中国内陆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	何一民 (7)
早期南方丝绸之路再探讨——以长江上游地区早期佛像传入为例·····	何志国 (13)
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看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	邱登成 (20)
从笮巫青铜立人看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	王文君 (28)
从三星堆出土的海贝看古蜀国的对外交流·····	范小平 (36)
近年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新进展·····	邹一清 (43)
从大石文化关联看三星堆文化元素在南方丝绸之路西线的传播·····	赵廉莲 (47)
唐代经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缅经济文化交流·····	王 韵 (53)
秦汉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	李桂芳 (58)
从《史记西南夷列传》看南方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	田一平 (62)
什邡出土早期点数骰子南方丝绸之路传入论·····	刘章泽 杨 剑 (67)
川滇文献有关南方丝绸之路资料辑录·····	郑小琼 (70)
滇西地区新石器文化分析·····	江章华 (81)
商周时期古蜀金沙的祭祀活动探讨·····	黄剑华 (93)
秦汉时期西南丝绸之路对昭通地区的影响·····	顾 霞 (99)
从《何君尊榭阁刻石》谈南方丝绸之路牦牛道的开凿与意义·····	高俊刚 (102)
两汉中央王朝经略西南夷的政策变迁·····	杨丽华 (107)

图像传统与形式变迁：巴蜀青铜器图像研究·····	吴维羲	(115)
三星堆象形青铜器略论·····	范佳	(129)
三星堆青铜神树与西南“天梯”神话·····	邹芙都	(134)
古蜀的鸟崇拜及其演进轨迹·····	王凯	(143)
论三星堆青铜神坛与古蜀仙化思想·····	龚伟	(149)
从“五”的含义解释蜀人的“尚五”观念·····	李星明	(155)
蜀式连弧刃铜戈相关问题探析·····	明文秀	(163)
从彝族祭祖大典神座中的通天神树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	杨凤江 钟仕民	(170)
《全蜀艺文志》中“风谣”的文化解读·····	杨钊	(175)
南方丝绸之路与乐山·····	唐长寿	(181)
巴渝“望夫石”的由来及其演变·····	徐江	(191)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产与交通枢纽——雅安·····	黄家祥 李炳中	(195)
南方丝绸之路昭通段考·····	李竞恒	(202)
严道之于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郭凤武	(209)
嫫祖文化与丝绸之路·····	李德书	(213)
论三星堆、南方丝绸之路与丝绸之源嫫祖故里盐亭的关系·····	王堂甲	(220)
“峨眉”语源为“阿弥”考·····	汤洪	(230)
从青铜至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看四川与越南的文化交流——越南考察札记·····	雷雨	(231)
西汉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东线上的夜郎道初探·····	彭邦本	(237)
重回青铜时代——德阳打造“一带一路”青铜文化产业高地的思考·····	卢加强	(240)
后记·····		(1)

三星堆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

段渝 /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特聘首席教授

古代从四川经云南出域外，分别至东南亚、中亚、西亚及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国际交通线，经缅甸、印度、阿富汗等国，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为成都平原，由此向南分为东、中、西三线南行：西线为从四川经云南、缅甸到印度的“蜀身毒道”，东汉时又称“灵关道”或“牦牛道”，后称为川滇缅印道，这条线路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区域；中线为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的“步头道”和“进桑道”，或又统称为“安南道”，后来称为中越道；东线为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三条线路中，西线和中线在古代中国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古代中国在西南方向对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流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它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同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及欧洲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互动的载体。

一、学术和时代背景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于1877年提出的，用以指称中国丝绸西运罗马的交通道路，并用以泛称东西方国际交通线。长期以来，丝绸之路一直被认为是由长安出发，西经河西走廊，出西域，至中亚，而后进抵罗马帝国的惟一的一条中西交流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又确

认丝绸之路还包括长城以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由东海至南海经印度洋航行至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从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分别至缅甸、印度，中亚和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大大扩展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成都平原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甸、印度和越南等地区内，近年出土大量相同、相似或相关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中国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集结，同时在东南亚、南亚、中亚至地中海区域发现了大量中国文化因素，确切表明古代中国出西南地区同外部世界所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交流线路的存在。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线路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出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至西亚，以及从成都经云南至东南亚的古代中外国际交通线为“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纵贯亚洲，直抵欧洲地中海区域，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长、历史最悠久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动脉之一。

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改革开放大潮的促进下，四川省和云南省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界提出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并一度掀起研究热潮，取得可观的成果。但因研究领域局限在国内，以及其他各种原因而未能持续展开。

21世纪初，随着我们对三星堆文化内涵及其与越南、缅甸、印度和近东文明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对南方丝绸之路的认识也向着更加

深入的层面发展。我们认为,在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上,有两个十分重要而无法回避的学术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摆在面前:一是以往学术界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国内段,研究领域、对象和资料等多限于中国西南地区,而对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的研究则非常缺乏,难以形成南方丝绸之路的整体研究;二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认识到,南方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贸易通道,它实际上是古代中国同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等地各文明之间碰撞、交流、互动的重要纽带,是欧亚大陆相互影响、促进发展的文明载体,对欧亚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古代中国与欧亚文明关系的发展又对南方丝绸之路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提出将南方丝绸之路放在欧亚古代文明的背景下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这样才能充分发掘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大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并且大大丰富欧亚古代文明的研究内容。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提出了“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这一具有国际学术意义的重大科研课题,就这个方向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立项。我们的多项科研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同,被认为是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权威和中心。

近年,党中央制定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国家战略。在这一战略大背景下,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如火如荼,热火朝天,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也就更加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

二、研究现状

一)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状况

中国古代文献关于从西南地区通往缅甸、印度、阿富汗的最早记载,出自《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史记·大宛列传》,称此线路为“蜀身毒道”,

便是后来学术界通称的“南方丝绸之路”。《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里,提到罗马帝国“有水通益州(四川)”。此后,《新唐书·地理志》《蛮书》等也对这一交通线路有较详细的记述。古代中国与中南半岛的关系则略见于《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以及诸史所引《南越志》等。但是,诸书所载史事大多语焉不详,或相互抵牾,颇难缕析。在西方古文献尤其古希腊、罗马的各种文献里,也有一些关于古代中国西南与印度以及中亚、东南亚关系的记载,但大多简略而模糊,足以据信者并不多。

近世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西南的早期国际交通问题颇为关注,不少名家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中国印度之交通》一文,根据唐贞元间宰相贾耽的记述,论述中印之间有六条交通线,其中第六条是滇缅路。夏光南于1940年出版《中印缅道交通史》,亦据此对早期中印缅交通有所考证。方国瑜在1941年发表的《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中认为,“中印文化之最初交通,当由滇蜀道”。张星烺、冯承钧、丁山、岑仲勉、季羨林、饶宗颐、桑秀云、严耕望、杨宪益、陈炎、徐中舒、蒙文通、任乃强等分别从某一或某些方面对古代中国、缅甸、印度和中国、越南交通或文化交流进行过研究。但诸家所引证的资料未必尽确,且有任意比附之嫌,尤其没有引入考古资料所提供的证据,因而许多结论未获学术界认同。

国外学者对古代中缅印交通问题向来十分关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 Pelliot)的《交广印度两道考》是这一领域的名作,但详于交广道而略于中印道。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B. Laufer),法国汉学家玉尔(Henry Yule)、沙畹(Chavannes),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先后对此有过专门研究。英国学者哈威的《缅甸史》、缅甸学者波巴信的《缅甸史》,亦对中缅印早期交通进行过阐述,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

对此也有涉及，但多据伯希和之说，缺乏创新研究。越南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译本）、黎文兰等《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河内科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则从越南历史和考古的角度对先秦两汉时期越南与中国西南的文化和族群等关系问题发表了不尽相同的意见，其中明显存在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以致歪曲之处。

以上各项成果主要是从交通路线的角度对古代中国西南与南亚、中亚、西亚和东南亚的关系所进行的考证和论述，缺乏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充分结合从而从古代文明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并且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难以看出古代中国西南与南亚、中亚、西亚和东南亚文明关系的发生、发展和演变。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

迄今学术界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1. 南方丝绸之路的走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步深化，一致认为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起点为成都平原，从成都向南分为东、中、西三条主线：西线经今四川双流、新津、邛崃、雅安、荣经、汉源、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越金沙江至云南大姚、姚安，西折至大理，这条线路被称为“零关道”（或作“灵关道”，东汉时又称“牦牛道”）。中线从成都南行，经今四川乐山、峨嵋、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中、西两线在大理会合后，继续西行至今永平，称为“永昌道”。从永平翻博南山、渡澜沧江，经保山渡怒江，出腾冲至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抵缅甸八莫。东线从四川经贵州西北，经广西、广东至南海，这条线路称为“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的国际通道，它的国外段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即历史上

有名的“蜀身毒道”，后又称“川滇缅印道”，从四川出云南经缅甸八莫或密支那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以至中亚、西亚。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线路最漫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中路是一条水陆相间的交通线，水陆分程的起点为云南步头，先由陆路从蜀、滇之间的五尺道至昆明、晋宁，再从晋宁至通海，利用红河下航越南，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的最古老的一条水路，秦灭蜀后，蜀王子安阳王即从此道南迁至越南北部立国。东路，据《水经·叶榆水注》和台湾严耕望教授考证，应是出昆明经弥明，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入越南河江、宣光，抵达河内。

2. 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时代

一种观点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凿起于秦并巴蜀之后，通于西汉时期，五尺道为秦灭巴蜀后初创，秦始皇时期基本建成，汉武帝时期完成。段渝教授、葛建雄教授认为五尺道在秦王朝正式开凿之前就已存在，要比常璜开凿（公元前221年）早得多。宋治民教授、李安民先生等认为四川经曲靖到昆明地区和昆明地区到滇西的民间古道在秦汉以前实际已经存在。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学者们注意到其中明显的印度和近东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结，于是提出南方丝绸之路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新看法，段渝教授认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世纪、15世纪，早于曾由季羨林教授所提中印交通起于公元前4世纪，向达教授所提公元前5世纪，丁山教授所提公元前6世纪，日本藤田丰八所提公元前11世纪等说法。段渝教授的意见在学术界获得重要响应和支持。

3. 南方丝绸之路的功能

学术界认为，南方丝绸之路至少发挥了三种功能：文化交流、对外贸易、民族迁徙。

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功能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没有异议。

对外贸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功能之一，

这一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徐中舒、童恩正、段渝等学者都先后论述了先秦时期成都工商业之繁荣，并与中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和文化交往。

古蜀对外贸易中最著名的货物是丝绸。段渝教授认为，古史传说西陵氏之女嫫祖发明蚕桑丝绸并非虚言，青铜器铭文和《左传》等记载均可证实。而四川是中国丝绸的原产地和早期起源地之一，至迟在战国时代已具有相当规模。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童恩正教授认为这些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经“西南丝道”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手到达中亚的。蜀布是《史记》中多次提到的贸易货物，任乃强教授认为蜀布是古代蜀地行销印、缅等地数量最大的商品，他考证认为蜀布应是蜀地当时特产的苧麻布。段渝最近考证，张骞在阿富汗看到的蜀布其实就是四川生产的丝绸。

多数研究者认为，南方丝绸之路国际贸易行用的货币是一种产于印度洋的白色海贝。古代文献对印度洋地区使用贝币有相当多的记载，方国瑜教授认为这种海贝就是货币，彭信威先生认为云南用贝币的历史悠久，是受印度的影响所致。在古蜀腹地三星堆以及云南地区都出土了大量海贝，应是从印度地区交换而来。也有学者认为西南地区出土的海贝是装饰品，或认为海贝来源于南海，但这些看法未获多数学者的认同。

学术界普遍认为，自秦汉以后，南方丝绸之路是由中央王朝掌控的贸易线，而对先秦时期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对外贸易的性质则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民间自由贸易，另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官方贸易，这可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发现为证，象牙、海贝等外来文化因素等，更多地集结在像三星堆这样的大型都城和区域统治中心内，应属明证。古蜀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对外贸易，主要有直接贩运和转口贸易两种形式。在转口贸易中，古蜀产品要抵达南亚等地，需由古蜀—滇—外国商人经过多次转

口交易来完成。

古代文献记载表明，先秦时期中国西部存在一条由北而南的民族迁徙通道。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民族走廊和藏彝走廊概念。李绍明教授指出，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是一条民族走廊，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则是一条古代交通线，南方丝绸之路即是藏彝走廊中的一条通道。段渝教授认为，藏彝走廊是连接南、北丝路的枢纽，而南、北丝路是古代中国最早的世界窗口。学术界对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的研究大有逐渐升温的趋势，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会更加丰富。

4. 南方丝绸之路与东南亚文明

1983年童恩正教授发表《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除了提到巴蜀向越南等东南亚大陆地区传播中原文化外，还简略讨论了巴蜀文化本身在北越地区的传播，这主要是指青铜文化。同年蒙文通教授遗著《越史丛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安阳王杂考》一章提出，战国末秦代之际，蜀人向越南的大规模南迁，对越南民族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蒙文通教授的观点，在越南学术界有不同认识。

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是，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与东南亚就发生了若干文化联系。在相互间的各种交往中，中国常常处于主导地位，而东南亚古文化中明显受到中国影响的某些重要因素，其发源地或表现得相当集中的地区，就是古代巴蜀，云南则是传播的重要通道。

5. 南方丝绸之路与南亚文明

季羨林教授《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及德国雅各比(H·Jacobi)在普鲁士科学研究会议报告引公元前320—315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考第亚(Kautilya)所著书，说到“支那(Cina)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梵文经典《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摩奴法典》(Manou)等书中有“丝”的记载及支那名称，陈茜先生认为这些丝织品来自中国四川。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考证,“支那”(Cina)一名乃是“秦”的对音。段渝教授在《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中指出,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是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印度古书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又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Cina这个名称从印度转播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生语,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说明了古蜀丝绸对西方的影响。南方丝绸之路上使用的通用货币为海贝,反映了南亚文明对中国西南文化的影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海贝、海洋生物雕像、城市文明、人体装饰艺术、神树崇拜,以及象征南亚热带丛林文化的大量象牙,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证实了中国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关系。何峥教授从文字源流的角度分析了印度河文明的文字与中国商代文字的异同,认为三星堆刻符与印度河文字有紧密联系,在中国原始文字符号传播到印度河地带时起了桥梁作用。日本成家彻郎教授认为,巴蜀古文字与中亚阿拉米文字有关,古代中国的印章发源于四川,而巴蜀印章是从古印度和中亚引入的文化因素。这几个问题都至关重要,必须寻找更多的证据加以进一步实证,从而深化对古代中国对外开放与交流的认识。

6. 南方丝绸之路与近东和欧洲古代文明

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经由西南地区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期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就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张增祺研究员注意到了西亚文化对中国西南地区古文化的影响,巴蜀和滇文化区西亚石髓珠和琉璃珠的发现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已发生的事实。段渝教授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物全身雕像、人头像、人面像,还有兽面像等,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于

中国本土的文化,在殷商时代的全中国范围内完全找不到这类文化因素的渊源,而青铜人物雕像、金杖、金面罩的传统见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权杖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也有使用权杖的传统,黄金面罩也是最早见于美索不达米亚,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其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上述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吸收了上述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张正明教授亦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西南夷青铜文化确有西亚文明的因素。

杨宪益先生认为,西方地中海的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便是蜀国生产的丝。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的书中便出现了“赛力丝”(Seres)这个国名,意为“丝国”。据考证,Seres是指古代蜀国。童恩正、武敏、段渝等学者也支持古蜀丝绸是南、北丝绸之路的重要物品,远销近东地区的观点。段渝明确提出,先秦巴蜀丝绸文化的西传丰富了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的内容,并使南方丝绸之路向欧洲延伸。

三、重大科研项目、学术会议和宣传报道

2007年至今,我们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有关南方丝绸之路的科研项目30余项,并长期与德阳市文联和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合作开展三星堆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如2006~2007年在三星堆博物馆举办的“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展”,2007年在三星堆博物馆举行的“三星堆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2011年在三星堆博物馆举行的“三星堆与南丝路: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在雅安举行的“南方丝绸之路研讨会”等等,在国内学术界、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国际上也获得称誉。

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

在国内，段渝等多次应邀到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昆明、贵阳、喀什等地做南方丝绸之路报告，获得很大成功。

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以及其他省市电视台对段渝等学者进行了多次采访并制作电视节目播出，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很大反响。

我们在国际讲坛上宣传南丝路也获得极大成功。如，2014年3月中法两国在巴黎举办了题为“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永恒通国际学术研讨会”，段渝教授在大会上做了题为《南方丝绸之路与古代中西交流》主题报告，受到了中外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欧洲各主流媒体进行了

大量报道，中国中央电视台一套2014年3月31日“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了会议开幕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新闻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多家媒体和网站进行了报道，法国多家电视台和媒体也在当天进行了报道。我们还在印度、伊朗、泰国、越南等国际讲坛上做了大量南方丝绸之路的学术演讲，获得各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赞扬。2014年9月，段渝绘制的《南方丝绸之路示意图》和《丝绸之路示意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丝绸之路创意城市展”展出，获得高度评价。

成都：中国三大经济带的交汇点 与中国内陆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

何一民 /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

摘要：成都虽然地处四川盆地，对外交通不便，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但正是这种地理上的封闭性成就了成都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成都在中国宏观地理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三大交通线和经济带的交汇点。秦汉以前，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就开通，并延续了2000多年的发展。汉以后，张骞“凿空”西域，开通北方丝绸之路，成都的蜀锦等丝绸产品就一直是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商品；而在南北朝的两百多年间，当河西走廊交通因战乱受阻，北方丝绸之路中断时，以成都为起点，经过甘南、青海进入西域的“河南道”，成为新的北方丝绸之路，使中国与亚欧国家的贸易一直未曾中断。秦汉以后，成都成为岷江航运的起点，成都的人和物乘船顺岷江而下直接进入川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各主要城市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因而成都成为中国古代三大经济带的交汇点和交通、经济枢纽，由此推动了成都在汉唐时期两次崛起。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区域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确立了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发展战略，为成都和四川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成都应构建成为21世纪中国内陆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为此，需要进行新的顶层设计和采取一系列措施。

关键词：成都 一带一路 枢纽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的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为了推动中国经济走上新台阶，更加健康地、可持续地发展，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该构想之后被写入三中全会《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是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国家发展战略，能够为化解中国产能过剩和促进工业能力持续发展提供出路；同时也是与相关各国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的

对外开放战略。

国家实施建设“一路一带”战略，为中国各省区和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四川作为西部省区，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近年来，相继采取了一些措施参与“一带一路”，如成都开通了贯穿“新丝绸之路”的“蓉欧”快铁；2014年7月，成都又开通了首趟中亚货运列车。2014年以来，四川省委省政府也相应地对四川省如何融入“一路一带”建设提出了若干措施。但是相比西部其他省区，四川在“一路一带”建设和发展思路及顶层设计方面的步伐相对较慢。因而在国家关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只有成都进入七个“高地”之一。

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

我们认为成都在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应该重新定位，特别是应根据历史上成都的重要地位和发展特点，将成都在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定位为中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枢纽。

一、成都在历史上就是中国内陆三大经济带的交汇点

四川虽然地处中国内陆，周边均为高山环绕，对外交通不便，长期有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但是地理上的封闭并不能阻止蜀人对外联系、交流的决心和行动。早在先秦时期，古蜀人就突破了交通地理对四川的束缚，开辟了三条通道：一是开辟北起成都，南经云南至缅甸、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二是开辟了南起四川成都，过广汉、德阳、梓潼，越大剑山，经广元而出川，在陕西勉县褒城附近向左拐，然后沿褒河过石门，穿越秦岭，出斜谷，直通八百里秦川，全长1000余千米的古蜀道，即川陕通道；三是开辟了从成都沿岷江而下水陆并进，直抵大海的长江通道。在汉代，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对外开拓，成都发展成为“五都”之一，是秦岭、淮河以南唯一的工商业大都会，从而成为中国三大经济带的交汇点，成为中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枢纽。近年来大量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记载表明，成都自先秦以来就是中国内陆对外开放的重要枢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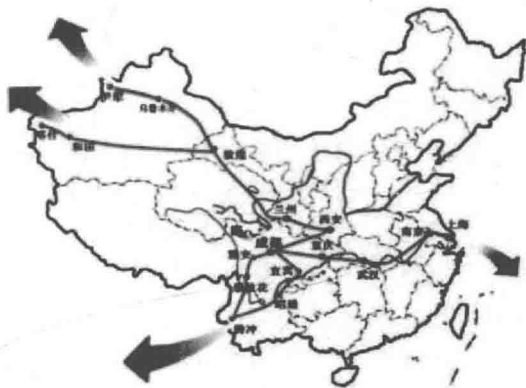
汉唐时期，成都作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再次成为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三大经济带的交汇点。正是这种优越的地理区位成就了成都在唐宋时期的再一次崛起与繁荣，居于中国工商业大都会的前列，史称“扬一益二”。

二、成都在汉唐时期是中国南、北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成都自先秦以后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始发地，大量成都生产的丝绸、茶叶、铁器等通过“蜀一身毒道”，经今云南，进入缅甸，然后抵

达印度。《史记》等历史文献对此有所记载，而近30多年来有若干学者对南方丝绸之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确认了这条商贸通道的存在，同时大量考古发掘也对此有印证。不仅成都的物资通过这条通道运到南亚，而且印度和南亚等国的物资及文化也从这条“蜀—身毒道”传入成都，并经成都传入西南、中原和长江中下游。两汉时期，汉朝中央政府多次对“西南夷”地区进行开发，修筑五尺道等，使成都与云南、缅甸的交通长期保持通畅。

张骞“凿空”西域后，成都成为北方丝绸之



路最重要的商品——丝绸的原产地和动力源，从先秦至隋唐，成都的蜀锦代表了中国丝织品的最高水平，蜀锦生产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南朝宋时期的学者山谦之在《丹阳记》中记载：“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乃有之。”这段话很明确地表明，在三国以前，只有成都有锦，北方魏国和江东吴国开始织锦都是在三国以后才开始。因而汉代蜀锦是南、北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商品，而蜀锦大部分产自于成都。

成都在整个南北丝路的构架中长期充当了最重要的枢纽之一，为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考古资料证实，成都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对外交流自古蜀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北方丝绸之路开启后，成都与长安的商业贸易经川陕道也日益兴盛，正是由于有了成都所提供的大量丝绸织品，丝绸之路才有其名。三国两晋南

北朝时期，中原内乱，战争频仍，河西走廊的交通中断，北方丝绸之路东段的商贸也因之而停顿，中原与西域和亚欧等国的经济、文化联系随之而中断，南北对立也导致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受阻。而此一时期，成都承担了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作用。一方面成都与南方丝绸之路各地的联系在此一时期仍然保持，特别是民间往来较为频繁。此外，蜀地人士从远古时期开始就在成都西北方向开辟了一条重要通道，即从成都出发，溯岷江河谷西北而上，抵达岷山的松潘城后，再向西经若尔盖草原出川西高原，进入甘南地区，然后再到青海，并从青海进入西域，这条民间商道在南北朝时期被称之为“河南道”。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战乱而中断以后，“河南道”成为官商共用之路，成为西北各国政权与南朝政权联系的主要交通要道，实际上也就成为中国内陆地区与西域和亚欧各国联系的又一条新的北方丝绸之路，在长达 200 余年间的南北朝时期，成都成为这条新丝绸之路的枢纽，蜀地和东南地区的若干物资在成都集散之后，即通过这条新的北方丝绸之路与甘肃、青海、西域和亚欧等地进行交流。

至于成都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文化联系也可以上溯到开明王朝时期，如金沙遗址所出土的玉琮就与良渚出土的玉琮有相似之处；而相关文献也明确记载开明王朝的开国之君鳖灵就是湖湘人士。秦汉至唐宋，成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成都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对于当时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秦、汉、唐三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代，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成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着力建设连接成都与长安之间的陆路交通，经营和开发成都至青海的“河南道”开通成都与“西南夷”的交通，成都正是通过这些陆路交通道路融入南、北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体系之中。自此，南、北丝路贸易网通过成都这个枢纽连接在一起。

此一时期，成都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城市，与长江沿岸城市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因而，汉唐时期，成都承担了沟通南、北丝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枢纽作用。正是因为成都成为三大经济带的交汇点和枢纽，成都才在汉唐时期两次崛起，汉代“列备五都”，唐代为“扬一益二”，成为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际化大都会。

三、应重新对成都在“一带一路”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定位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具备了成都这种三大经济带交汇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内陆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枢纽。汉、唐的都城长安，地位虽然重要，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但是由于秦岭的阻隔，长安与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系，只能通过成都来实现。至于洛阳、开封等城市，同样如此。汉唐时期，南方的城市也不具备这样的地理区位优势，唐代扬州虽然号称“第一”，但不能直接与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连接，至于建业（康）、武昌、重庆等长江沿岸城市在汉唐时期都未能成为重要的工商业大都会，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相对较低。只有成都位于天府之国，多条重要的交通线和经济带都汇集在这里。成都在中国宏观地理中的区位优势至今仍然存在，因而重新审视“一带一路”战略，成都虽然不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但却可以成为内陆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成为三大经济带的交汇点。20 世纪后期以来，新的交通革命使成都对内对外的交通已经初步建成了多元化、多层次化的立体交通运输体系，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与外部建立了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陆路也开通了与亚欧的陆上交通铁路快线——蓉新欧铁路，通过现代“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运输至波兰的货物仅需要 12 天就能到达，比从沿海港口经海运到欧洲要节省 30～40 天；成都向南通过成昆铁路、成昆高速公路等现代交通可直接从云南进入南亚、东